

杨遇春先生 捐赠唐颜真卿《多宝塔碑》拓本考略

陈乐道

2007年，在甘肃省档案馆开展的“档案资源建设年”之初，88岁高龄的杨遇春先生将平生珍藏的两件唐代敦煌卷子及11件拓碑史料捐赠给了省档案馆，填补了省馆馆藏的不足与空白。杨遇春先生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5期），后转入兰州市交通部门工作。他一生喜好收藏，书法造诣深厚，对文物字画碑帖颇有研究。2007年4月在省档案馆举行的捐赠仪式上，杨老先生发表了捐赠感言。他说，耄耋之年，早有捐献的想法，得知省档案馆抢救、保护珍贵档案史料，欣与调查流散敦煌卷子的同志取得了联系，方有机缘与之接触，捐献个人收藏，交由国家妥善保管，“聊表个人保护祖国地方文物的微忱。”唐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拓本即是这次捐献的珍贵史料之一。

《多宝塔碑》，又称《多宝塔感应碑》《千福寺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碑文叙述了楚金禅师发愿兴建多宝塔的过程及有关佛事。原碑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时移西安碑林。碑高285厘米，宽102厘米，文34行，行66字。岑勋撰文，徐浩隶书题额，颜真卿书碑，史华刊石。佛教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传说，西京龙兴寺僧人楚金禅师静夜诵读《法华经》时，觉得时有多宝塔浮现眼前，于是发愿要把多宝塔变成现实。后选中了千福寺这块宝地，在众人襄助下，于天宝元年（741年）兴工，天宝四年（744）落成，唐玄宗曾为立塔赠银50万、绢上千匹。楚金禅师死后，唐玄宗特派使者吊唁，监护丧事，并亲自书写了塔额。天宝

崔、李等25姓。为今天中国朝鲜族各姓氏追溯祖源和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朝鲜谱牒的形制很完备，主要世系表一般采用欧式，有谱有牒，牒中对于祖先生卒、婚配、生子和墓葬的记述与汉族谱牒几乎相



十一年（752年）立碑，这就是《多宝塔碑》。

《多宝塔碑》是颜真卿书法的代表作品之一。颜真卿（709 - 780年），山东临沂人，字清臣。开元二十二年

同。除世系表外，谱牒中还记述祖先传记、姓氏源流和迁徙考等，有比较完备严格的谱例，其特点都与汉族谱牒十分近似，包含的资料十分丰富。档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730030）

(734年)中进士,历任户部侍郎、尚书左丞、刑部尚书诸职,曾受封为鲁郡公,任平原郡为太守,后世称颜鲁公、颜平原、颜太师,颜文忠(谥)。在任平原太守时,安禄山起兵范阳,河北各郡皆降服,惟有颜真卿固守,为义军盟主。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忠烈悲壮。他是中唐时期书法创新的代表人物,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有力,神彩飞动。其书法既继承了前人书风中的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自成一派,称为“颜体”。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中列其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宋代大书法家苏轼云:“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画至吴道子,书至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据专家研究和相关资料显示,颜真卿一生书碑甚多,西安碑林即藏《多宝塔碑》《臧怀恪碑》《郭家庙碑》《争座位帖》《颜勤礼碑》《马磷残碑》《颜氏家庙碑》7种。而《多宝塔碑》为其所有碑版中年代最早者,乃颜真卿44岁时作品,是颜书诸碑中字体较小者,为其传世最早的碑刻之作。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此碑直刀平底,镌刻较深,又因石质坚润,剥落甚少,所以传世善本锋芒犹新。

《多宝塔碑》传世最早为北宋拓本。北宋拓本,31行“归我帝力”之“力”字尚未损。全碑字口方棱,字画之间牵丝甚清晰。

南宋拓本,15行“凿井见泥”之“凿”字未损,31行“归我帝力”之“力”字(图2)、33行“王可托”之“托”字稍损。

明中期拓本,14行“天文挂搭”之“挂”字上“土”部完好,24行“方寸千名”之“千”字完好。

明末清初拓本,31行“归我帝力”之“归”字完好,“我”字左上半泐(le,石头风化而形成的纹理)。32行“佛知见法为无”6字、32行“空王可托本原同归”8字、末行“大夫行内侍赵思”7字皆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拓本,文物出版社影印有宋拓《唐颜真卿书多宝塔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收有明中期整拓、《西安碑林名碑》辑有馆藏明末清初拓。

拓本以初拓、旧拓最为珍贵。杨遇春先生捐赠我馆的这册唐颜真卿《多宝塔碑》拓本,经过剪裁装裱而成,封面、底均为木版。拓本末尾粘贴有辽阳(今辽宁)人桂芬的题跋,用另纸写就,纸呈黄色,竖行墨书,共两页19行,楷体。跋前盖有阴文引首章,跋尾盖有阴文“桂芬”名章。杨遇春先生早在1958年6月亲自题签为“宋拓颜真

卿多宝塔碑”。那么,其依据又在哪里?

根据分析,我认为杨老的判断绝非向壁杜撰,而是自有道理。不仅靠的是自己对书法碑刻的独到体悟,更主要的是他援引了前人的题跋,这就是桂芬的题跋。今将“题跋”标点断句,抄录于兹:“唐颜文忠书《千福寺碑》,光绪甲午岁得之于阿阳鲍氏子。鲍故儒家子,以嗜博荡业,以是帖求售,为偿博进。时余年甫志学,亦不辨其佳恶,但以纸色古旧,慢以数金得之。逾年,随侍家大人晋京,道出西安,因得游所谓碑林,获观是碑,岿然矗立,多半漫漶剥落,迥非此本旧观,始讶是册之非近世物,然尚未能考知为何时拓本也。至京师,又得纵观各嗜古家及厂肆所有旧本,以较是册,磨灭皆逊此册之完整,乃喜而珍弃于篋。余拙于书,好为泛览之学,不复装整,几饱虫蚀矣。其后家君见背,人事牵缠,囊笔奔走,益复无暇及此。岁丁巳,权新疆洛浦县事,县复无事,偶检行篋,不意是册相随,余为考其时代。按,扬州江郑堂跋是碑,谓:此碑明初时则无化城之‘化’字,期满六年之‘期’字,还惧真龙之‘龙’字,史华刊之‘刊’字,已断泐不全。逮明中叶,宿心凿井之‘凿’字,又漫漶不可辨识矣。康熙时,又缺‘可托本原同归’六字。谛视是册刊字,略有断泐,其余江氏所举各字固都完好。审是,则是册纵非宋拓,亦为金元时拓本无疑。噫!新学日盛,古物日微,余于童年无意而获是册,可不幸欤!特出原委于简端,俾吾之子孙有考焉。丁巳六月既望辽阳桂芬书”

从上面桂芬的题跋,我们知道:1.杨遇春先生捐赠的《千福寺多宝塔碑》拓本流传有绪,曾经桂芬收藏。桂芬,辽阳人,可能系满族旗人(其详细生平待查)。那是清代光绪甲午年(1895年),随从在阿阳(今甘肃静宁县)做官的父亲读书的桂芬,从当地一位姓鲍的人家的子弟手里购得此拓本。鲍氏本是书香门第,谁知其子弟嗜好赌博,以致将家业荡析,为偿还赌资,就将家藏的《多宝塔碑》拓本出卖,桂芬当时看到此拓本“纸色古旧”,就掏钱收了下来。2.次年即1896年,桂芬随父前往北京的时候,路过西安,参观了碑林,并看到《多宝塔碑》原碑,已经“多半漫漶剥落,迥非此本旧观”,从而惊讶他收藏的此碑拓本“非近世物”,应属旧拓,但他仍确定不了其年代。3.到了北京之后,桂芬又遍览了众多收藏家及古玩店有关此碑的藏品,两相比较,发现均逊色于他所得拓本。4.农历丁巳年(1917年),桂芬远赴新疆做官,代理洛浦县知事。县衙无事,清闲寂寥。一天,他偶然翻弄书篋,无意中瞥见此拓本也随身带来,就才安下心来,根据扬州江郑堂的跋语,做了一番考证工夫。江郑堂即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博问强记,心贯群经,著有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国朝汉学师承记》。考证的结果,

《甘肃奏稿》 中的清末甘肃警政档案史料

张利荣

近代中国警察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漫长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产物之一。它既是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延续，又是西方近代警政体系的移植，是近代中国社会艰难转型中所引进的西方法制系统中颇显成效的一部分。社会转型时期，治安往往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古今中外，莫非如是。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的警政建设，包括研究相对落后区域的警政建设历程，探究其得失利弊，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对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现今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然而，自近代警察制度在中国产生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警政史的研究，在一般学者的心目中，总觉得算不上是一门大学问，故多不屑一顾”。清末民国时期有关近代中国警政研究的论著，十分少见。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警政史的研究，不但起步晚，而且进展慢，研究成

果数量不多，质量上乘者也屈指可数。整体而言，这一研究目前尚属起步阶段。尤其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特别是内地相对偏远地区的警察制度的建立、发展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方面缺少深入、细致的考察，以至基本情况不明，几成无人问津的学术死角。近代甘肃的警政研究状况即是如此。

时至今日，近代甘肃警政建设这一重要研究领域一直鲜为人所关注，涉入者空谷足音；相关研究成果稀少，如凤毛麟角。造成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近代甘肃经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载籍缺失，文献极度匮乏，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很少，使得这种研究工作有相当大的难度。由于对历史文献价值的认识不足，近代甘肃毁损历史文献的事件时有发生。民国时期，甘肃曾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毁档事件，一次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所毁档案上起明朝，下迄清末；一次是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所毁档案时限在1915年至1930年间。清末民国时期大量珍贵的档案

桂芬认为，此拓本“纵非宋拓，亦为金元时拓本无疑。”

显然，杨遇春先生的判断是沿用桂芬的考证，而桂芬又是根据江郑堂即江藩对《多宝塔碑》的题跋而来。对此，尽管我还不能贸然苟同，其确切年代尚待考订。但我认为此拓应属旧拓当是无疑，具体说，应系明代以前的拓本。理由是：流传有绪。

通过我多次对此拓文尾所盖三方前人收藏印章（另一方是杨遇春先生自己的，盖在最后）的仔细辨认，隐约觉得是杨继盛的，其中一方像“继盛藏宝”的字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拓就有了更重要的文物研究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杨继盛乃是明代著名的历史人物，又是书法家，而收藏碑拓，也就顺理成章，自是意料中之事。按，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叔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进士，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大将仇鸾对俺答畏怯受

协，被贬官为狄道（今临洮）典史。杨继盛到临洮后，兴教育，修水利，开煤矿，为当地办了许多好事。后起用为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世宗怒，下诏处死。工书画，有“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楹联，笔力老健。

综上证，我略作推想：杨遇春先生捐赠我馆的这册唐颜真卿《多宝塔碑》拓本，明代末年可能曾一度经过著名历史人物、书法家杨继盛收藏，后辗转到了阿阳（今静宁）鲍氏之手。清末，再经辽阳（今辽宁）人桂芬递藏，后散出流入古玩书肆，被杨老偶然捡得，认真呵护，历达半个多世纪，最后捐献于国家，堪谓饱阅沧桑！抛砖如此，聊为嚆矢，敬祈方家进一步的鉴定。档

（作者单位：甘肃省档案馆兰州/730010）